

汉语言文字学书系
HANYUYAN WENZIXUE SHUXI

汉语并列双音词构词规律研究

——以《墨子》语料为中心

肖晓晖◎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汉语言文字学书系
HANYUYAN WENZIXUE SHUXI

汉语并列双音词构词规律研究

——以《墨子》语料为中心

肖晓晖◎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并列双音词构词规律研究：以墨子语料为中心/肖晓晖著.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1

ISBN 978 - 7 - 81127 - 809 - 5

I. 汉… II. 肖… III. 汉语 - 构词法 - 研究 IV. H1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9498 号

汉语并列双音词构词规律研究：以墨子语料为中心

作 者 肖晓晖

责任编辑 黄松毅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封面设计 刘之君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 - 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1127 - 809 - 5/H · 809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王 宁

汉语构词法的研究从 50 年代开始,受到很多语言学大家的关注。但是多年来占主流的方法仍然是从句法结构推衍出的结构形式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对双音合成词的分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当深入到构词的原由和构词以后词素和成词的关系问题上时,仅仅这样做就显得单薄了。从 90 年代起,我们开始从中国训诂学的理论出发,吸收国外语义学的相关成果,希望能够在沟通古今的基础上,把结构分析作为一个起点,进一步探讨构词的语义特征和词素结合的根本原因。肖晓晖以《墨子》为基础语料,用内容和形式、语法和语义、历史和现状结合的方法,来探讨并列双音词的构词规律,应当说是这个学术理念的一种尝试。

词汇音义关系的任意性和理据性一直是一个被关注的问题,有一些绝对的说法或强调任意性否定理据性,或强调理据性否定任意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的观念最为先进:《荀子》的“约定俗成”理论在“任意性”上发挥得最为透彻;早在汉代,训诂学中通过声训就已经有了“音近义通”的观

念。在中国语言学史上,语言音和义总体系统上的任意性和个体构词上的理据性从来就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两个说明不同领域问题、解释两种不同现象的相辅相成的原理。汉语双音合成词的构词,两个词素的结合,是任意性的,还是有理据、可解释的呢?已经有了一些论著讨论了现代物件的命名,证明了很多多音的物件名称是有构词理据的,但要想证明构词的理据的普遍性,必须把视野扩大到一般的双音合成词。我们的想法是,如果两个词素的搭配没有可解释性,那就证明是任意性的,也就是偶然的;如果它们的搭配可解释或者有些没有搭配在一起的词素的不可搭配性也可以解释,那就说明这种合成不是任意的。有很多双音词是由古代短语演变为词的,西方语言学称之为“词汇化”,列入“语法化”范围,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单音语素的凝结现象,而要了解这种现象,一定要深入了解古汉语,要有历时发展的眼光。

肖晓晖在他的这部著作里,首先提出了《墨子》中双字组合的传承,这就是在历时演变中研究构词。选择一批古代汉语文献的材料,与现代汉语联系起来考虑,这是词汇学研究应当采取的重要方法。由于词汇发展的累积律,现代汉语语素义多为古义,不沟通古今难以研究深入。沟通古今增加了得出结论的难度,但也丰富了论证的事实依据,并使结论更为扎实。

之后,他提出了并列双音合成词的两个语素是相互选择的。他吸收了语义场理论的精神,在三个层次上,得出了语素相互选择的规律,也就是说,并列双音词有同义语素结合、反义语素结合、同类语素结合,但同样是同义词、反义词、同类词,有些可以结合,有些不可以结合,这种相互的选择是可以解释的。总起来说,就是阐明了语义的系统性对语素结合的决定作用。

他举出非常典型的语例,试着从词源意义来解释词素相互选择的规律。汉语词源意义对词汇意义的影响,在词源学研究中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在词汇构成的研究加以验证,晓晖大胆地接触到了这个问题,这对词源和词汇的研究都有推进。

我认为,晓晖的著作,在以上三个方面,不论是方法还是结论,都

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晓晖在本科阶段最后两年,选择了北师大中文系的中文信息处理方向,硕士论文选择玺印文字作为研究的重点,博士阶段学习训诂学,以此为基础,探讨汉语的词汇语义学,这个学习经历使他有了良好的知识结构。他有过沉下心来勤奋阅读古代文献同时加强语言理论学习的经历,也有过刻意吸收、深刻理解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学习过程,最后进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对语言材料的精心处理。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学术成长历程,在他的这部由博士论文加工而成的著作里,完全可以看出他在这个历程中巨大的收获。

中国训诂学博大精深,很多资源和理念还没有挖掘出来,训诂学走向现代的进程十分艰苦又非常有意义,晓晖的这部著作是他进入训诂学走向汉语词汇语义学探索的开端,唯愿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他不懈的努力产生的新成果。

2009 年于北师大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任务	1
1.2 研究背景	2
1.3 研究理念	8
1.4 语料来源	12
1.5 研究方法	14
第 2 章 并列双音词的界定	30
2.1 双音合成词与词组的区分	30
2.2 并列双音词与其他构词式的区分	41
第 3 章 并列双音词的发展及特点	59
3.1 汉语词汇发展的阶段和规律	59
3.2 并列双音词的发展	63
3.3 并列双音词的语素义	74
3.4 并列双音词的特点	89
第 4 章 《墨子》并列双字组合及其传承更替	93
4.1 《墨子》语料的处理	93
4.2 并列组合的语义关系	113
4.3 《墨子》词语及其在现代汉语中的传承更替	121

第5章 双音并列合成词语素的相互选择	129
5.1 从语义类聚之间的关系看语素的选择与结合	129
5.2 从语义类聚内部关系看语素的选择与结合	134
5.3 从语义对应性看语素的选择与结合	154
第6章 词源意义对语素结合的影响	165
6.1 词源影响语素结合之例证	165
6.2 词源意义与语素义关系分析	190
第7章 语素结合中的语法语序问题	193
7.1 语素结合中的语法问题	193
7.2 语素结合中的语序问题	210
结语	216
参考文献	218
后记	227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任务

我们所说的“并列双音词”,是就构词时组成成分的语法关系而言的,即两个语法地位、语法功能相同的成分连接在一起而形成的双音节合成词。从语素结构学(morphotactics)的角度来看,并列词的内部结构属于平面型(flat form),而不是层级型(hierarchical form),两个构词语素之间是平行关系,语法地位相等,没有主从之分,不是“修饰限制”和“被修饰限制”的关系(Packard 2000:22)。根据这个定义,并列式复合词中的构词成分的语法类别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所说的“构词规律”是指从语义角度来看的语素结合成词的规律,也就是某个语素义在构词时和其他语素义相互选择、相互结合的规律及其内在动因。

在汉语中存在着大量可供构词的语素,为什么有些语素可以组合成并列式合成词,而另外的语素即使意义相同也不能互相结合?其中有没有什么规律?这些问题,是我们试图解答的。

例如,在一组同义语素中,有的可以和某个语素结合成词,有的却不能。“悲”“哀”两个语素的意义大致相当,都表示悲哀义,其组词情况却大不相同:在与欢乐义语素组合时,一般可以说“悲欢”、“悲喜”,不说“悲乐”;相反,“哀”可以和“乐”组合,却很少与“欢”、“喜”结合,

这是为什么?“悲壮”、“悲愤”可以成词,“* 哀壮”、“* 哀愤”却不能成立,这是为什么?同样,“哀怨”可说,“* 悲怨”不可说,这又是为什么?

有时,有的组合凝固性更强,更为稳固,能够进入现代汉语复合词之列,而相似的另一些组合却是昙花一现,不能保留下来成为现代汉语复合词。同样是表示土地或土壤义,为什么“天地”结合成词并保留至今,而“天壤”只存在于成语里,本身不独立成词,“* 天土”则完全不成立?为什么“土地”、“土壤”一直到今天都是常用词,而“壤地”虽然在先秦汉语里出现过,却在词汇发展进程中很快消失了?

哪些语素可以结合成词?或者说哪些语素结合的紧密程度更高、成词的可能性更大?语素的结合、复合词的构成是随机的、任意的,还是有规律的?仅仅是约定俗成的语用习惯,还是可以解释的?是人们无意识的选择,还是语言自身内在机制作用的结果?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通过对《墨子》并列式双字组合与现代汉语并列合成词的对比分析来探讨汉语并列式双音合成词的语义结合规律。换言之,就是从语义的角度去考察:哪些语素可以结合成并列合成词,哪些不可以?其中语言内部有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本书要在词汇系统内部分析并列式双音合成词构词语素的语义关系,描述语素结合并凝固成词的现象,总结其规律,以此揭示出语素结合的合理性和可解释性,从而证明词义系统性是语义结合具有规律性的根本原因,语义结合的规律性是词义系统性在构词层面的体现。

1.2 研究背景

语言研究的任务在于描写语言现象,找出语言内部的规律和运行机制。现象的发掘和描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规律和机制的探寻则是研究的根本目的。学界越来越强调研究的解释力。正因为如此,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结合,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共时平面的语言现象,往往要通过历时变化过程的追溯才能得到很好的阐释。仅仅是共时

描写,不考虑历时变化,对诸多语言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在双音词研究领域,人们逐渐重视构词理据的研究。而构词过程中的语义规则和作用,理应成为构词理据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1.2.1 描写与解释

概括地说,语言研究有三种模式:规定性的(prescriptive)、描写性的(descriptive)和解释性的(explanatory)。19世纪以前的一些语言研究是规定性的,语言学家关注的是语言的规范,讨论的是哪些语言现象是规范的,哪些是不合规范的,试图对人们如何正确使用语言制定出规则。这种非科学的研究方式在19世纪后遭到摒弃。在索绪尔提出以语言的共时系统为对象进行研究,建立起现代语言学之后,以共时描写为特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渐渐成为欧美语言学界的主流。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严格遵循共时描写的原则,形成一整套方法,从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两个方面对语言各个层面的单位及结构关系进行描写分析,观察它们的分布状况和配置情形。应该说,这种研究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是对语言事实的客观描写,符合科学研究的精神,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语言学家运用这种描写法对一些语言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总结出了许多规律。当结构主义描写法发展到极盛之时,也同时为自己的未来埋下了危机。乔姆斯基开创和领导的形式主义学派就是对结构主义学派的反动。与结构主义一心关注对语言系统本身的描述不同,这一流派更强调对各种语言规律的解释。如果说结构主义要解决的是“是什么”或“有什么”这类问题的话,解释语言学努力回答的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语言中会有如此这般的语言现象和规律,其生成机制是什么?^①因此,形式主义语言学是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解释是描写之后的必然要求。没有前期的描写工作,解释就无从谈起。当然,解释语言学并非独此一家,与形式主义学派针锋相对的功能主义学派也可以归入解释语言学之列。

^① 参看徐烈炯《生成语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

当代语言学理论的价值核心是解释力。众多的学说和观点层出不穷,对它们进行评判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它们的解释力,看它们能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解释相关的语言现象和语言规律。当然,这种解释必须是简洁的,即用简单的原理在不同的条件下推衍出各种规律和现象,其根本的运作机制是简单的,只不过经过复杂的条件的过滤,折射出的光线的方向和颜色各不相同而已,正所谓“道一,万变不离其宗”。

1.2.2 共时与历时

自从索绪尔区分共时和历时并提出以语言的共时系统为研究对象以来,共时描写的研究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语言研究的主流。但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注意到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首先,当代语言学研究强调学说的解释力,而对语言现象和规律的解释往往要求助于语言的历时研究。因为,语言共时层面的差异往往源于历时状态的不同,共时现象是历时发展的结果和反映。在解答“为什么”、探讨语言内在运作机制时,经常要追溯某现象形成的历时过程。仅凭共时描写分析,是难以完成解释工作的。例如近年来语言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研究,就十分注重共时与历时研究的结合。其次,语言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的。只有相对的静止,没有绝对的静止,共时研究是在相对静止的基础上对一个变化体的研究。拉波夫(Labov)等人的研究就非常强调语言的变异性。

对共时和历时研究的区分,在学术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只有进行共时研究,才能真正找到语言的系统;同时,通过历时研究,才能看到语言的演变。中国传统训诂学在方法上往往不分共时和历时,这是它的一个缺陷。以乾嘉小学家为例,他们“以研究经学为主,把先秦文献语言当作一个共时平面来探讨,即使涉及后代材料,也是多系联而少分辨,注重求同与沟通,忽略辨异与发展的”(王宁 1996: 197),也就是说,他们“所使用的系联与比较方法着眼于平面的逻辑而不着眼于历史的发展”(王宁 1996: 199),这无疑制约了训诂学对语言

研究的贡献。不过,古人如此,是有着主客观两方面原因的。

首先,古代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传统小学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作为经学附庸出现的,人们研究语言和文字的出发点是为了阐释经典,因此笼统地把典籍文献(包括历代以来对经籍的注解)看作同一个平面的东西。即使后来传统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研究探索语言文字本身规律为职志,但长期以来的研究习惯和思维模式仍使得人们不太严格区分语言变化的历时层次。

此外,研究材料本身的性质也决定了共时历时界限的模糊性。传统语言研究以文献语言为中心,而长期以来,汉语书面语以先秦文献语言为典范,进行刻意的模仿,造成严重的言文分离。书面语言与先秦文献语言保持着相当大的一致性,并不反映语言的客观的历时发展。即以五经而论,汉魏人为之作注,唐人作疏,此后历代学者又反复解释阐发,直至清人集其大成,这些训诂成果可以说是历时堆积而成的,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一些语料或者能部分反映语言的时代层次,如汉魏人用双音词解释经书中的单音词,唐疏对汉魏传注中的旧词复加以解释。但是,总体来看,不管是哪个时代的注释材料,又都是以文言解释文言,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口语的真实情况。因此,传统训诂学在方法上对共时历时区分不是很清楚,这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在汉语词义研究方面,我们应在自觉分清共时历时研究的情况下把二者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训诂学的材料和成果。从词语的历时研究中,找到现代汉语词义构成、组合功能、发展变化的根源。

1.2.3 语义与理据

“语义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崭新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人类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就拿中国来说,学者们数千年来以语义尤其是词义为中心对文献语言进行阐释和研究,其成果非常丰硕,可谓汗牛充栋。对语义的重视,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传统。说它崭新,是指语义学在近几十年来得到新的发展。自现代语言学建立以来,语义研究处于冷落的境遇,远远落后于句法和音位的研究。

这是因为,“由于语义学涉及到人类思想深处的十分抽象的活动规律,往往使人感到深幻莫测,难以下手,因而在本世纪 60 年代以前语言学家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语言表达的表层结构(音位学和句法学),而忽视了构成表层结构基础的意义结构。”^①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有所改变。人们意识到,离开语义而只顾形式的研究是不完善的,许多语言现象必须借助语义来解释,一些潜在的规律必须通过语义来揭示。同时,认知科学、应用语言学(信息处理、机器翻译等)、符号学等学科的迅速成长不仅对语义学提出了诸多要求,也直接为语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手段,大大促进了语义学的发展。一时间,语义学成了语言研究领域中的热门。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语义学内部存在许多流派,其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差别很大,对语义本身的认识也有较大距离(徐烈炯 1995;张志毅、张庆云 2001;伍谦光 1988)。当代西方语义研究中的一些学说及研究模式和方法(如真值逻辑判断等)是否真的适合汉语研究,仍值得讨论。目前,“在汉语语言学的各个门类中,语义学是最薄弱的环节”(王宁 1996:8)。

汉语词汇研究领域里,中国传统语言学格外重视词语意义的研究,在词义的引申变化、同义词辨析、同源词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近几十年来,对双音合成词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结构方式的讨论上。具体来说,就是对汉语合成词的结构形式进行描写和分类。自上世纪初以来,主要有三种分类的角度:一是从内部语义关系来分类,持这种方法的主要是一些受传统学术影响较深的学者,但这种方法 40 年代以后影响不大。一是从内部语法关系来分类,例如赵元任的《国语入门》就把汉语复合词分为“主谓复合词”、“并列复合词”、“主从复合词”、“动宾复合词”、“动补复合词”等。一是根据构成成分的词类来分(如“名+名”、“动+动”等)。后两种分类法影响较大,常常结合起来用,如陆志韦等(1957)先按内部结构关系分为“主谓”“动宾”“并立”等九大类,再在每一大类之中分析构成成分的词

① 王寅《简明语义学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前言。

性。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的分类框架也大体是两种方法的结合。可以说,这种词性分类与内部结构分类相结合的分类法在国内语言学界非常流行。

很多学者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对汉语合成词展开研究。例如,对某一时期或某一部书中的复音词按照上述结构形式进行统计分类,观察该时间段内汉语合成词的发展状况。这二三十年来,出现很多类似的研究古代专书复音词的论文或著作。这种对某个特定时代复音词进行描写的工作当然很有必要,因为它是建构词汇发展史的基础工作。通过对这些描写、统计性研究结果的前后对照,我们就可以知道词汇发展的大概情形。例如,程湘清(1982)已经指出,先秦汉语中尚未出现主谓式复合词和动补式复合词,而根据董玉芝(1994)的统计,《抱朴子》中已经出现了少量的主谓式和动补式,可见这两类构词法是在汉魏时期发展起来的。但是,描写分类之后需要有进一步的研究。语法结构形式的描述,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而不是全部。

在静态描写的基础上,应该对词语的动态运作有进一步的探讨。例如,合成词的生成机制是什么?为什么有的语素可以互相选择并结合成词?这类问题是结构分析所不能完全解决的。要想真正弄清合成词形成的机制,必须从语义入手考察语素结合的动因,即构词理据。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对合成词构词理据的探究,但当代对合成词构词理据研究的热情和规模远远不如对结构方式的研究。王宁(1997a)指出,双音词的构词理据,应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点:原始构词时两个语素各自的意义,两个语素结合的语言原因和文化原因,与这两方面原因相关的语素结构模式。而目前的一些研究,如许光烈(1994)、王艾录、司富珍(2001)等,虽然对汉语合成词构词理据作了有益的探索,但多局限于举例性的个体理据,而且着眼点多为文化心理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我们认为,除了个体文化理据之外,应该更重视对语言内部规律的研究,应努力探寻促成语素结合的规律是什么、机制何在。

1.3 研究理念

1.3.1 语言是传承的

和世间万物一样,语言总是发展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语言。但变化是以传承为基础的,有继承才有发展。汉语尤其体现了语言的传承性。即以词汇为例:一般认为,在语言诸要素中,词汇最活跃,最易变化,最体现语言的变化性。而现代汉语双音词中有大量的历史传承词,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马真 1980),这部分词多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次较高的常用词。一般人往往意识不到其悠久的传承。双音词如此,更遑论单音词和单音语素了。先秦时代的一些词,在现代虽然不单独使用了,但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构词层面,保留在部分合成词之中。汉语这种突出的传承性表明,我们在语言研究中应将现状与历史联系起来,既要考虑到古今差异,也要充分重视古今沟通。现代汉语里保存着的某些语言因素,用静止孤立的观点是很难理解它们的,必须到先秦汉语中去究其根源。要想真正把汉语研究透彻,就不能不把现代汉语和先秦汉语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全面、深入的分析。

过去的词汇研究有把古今汉语割裂开来分别对待的风气。其实,语言是传承的,再加上一直以来汉语书面语对口语的影响很大,文言和白话(或者说,先秦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尤其是在词汇语义方面,它们的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王宁先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例如,王宁(1996:240-242)提到,先秦汉语中的一些规律,直接影响到现代汉语中的某些现象。“言”“语”在现代汉语中是同义语素,但是由它们组构的复合词却有着鲜明的区别:宣言、扬言、预言、诺言……耳语、告语、絮语……,为什么不可说“*宣语”、“*扬语”、“*耳言”、“*絮言”……?这就必须追溯到先秦时代,那个时

候的意义决定了它们后来的构词特点。王宁(1997a)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提出:文言和白话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绝然相离的鸿沟,研究时必须打破古今之界线,上下贯通。文章列举了先秦汉语直接被现代汉语承袭的几类情况,它们恰好是现代汉语研究中被忽视的语言现象,比如:文言词充作构词语素,有时比同义的口语词充作构词语素的构词能量高得多;现代汉语里的许多双音复合词,两个语素结合的原因必须到先秦汉语中去找,只作共时的静态分析是不行的;等等。此外,王宁(1997b、1999)从语义的角度、通过训诂材料对汉语双音词的语义结构及其凝结的历史原因作了探讨,并提出了鉴别“本源双音合成词”的方法。这些论文的核心思想是一贯的,即强调古今汉语的传承和沟通,试图纠正长期以来过分夸大古今汉语的差异性、在研究中割裂古今的做法。这种古今贯通的思路为汉语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

1.3.2 语义是中心

语言是用来传情达意的,意义是语言的根本。对汉语来说,语义的研究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汉语和印欧系语言在语言的基本组织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王力(1944)提出“意合法”(parataxis)概念,是从考察汉语自身特色出发而得出的一条结论。与英语、拉丁语等形态语言不同,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相关的句法成分之间往往包含着较大的语义容量和复杂的语义关系而基本上无形式标志”(陆俭明 1993:52)。这个看法的意义在于,“如果汉语确实使用了这种依靠语义而非依赖形式的组织法,那将极大地动摇传统的西方语言学理论。语法就将不再是纯粹的形式决定之法,至少有可能部分地是语义决定之法”(史有为 2000)。事实上,抛弃语言意义而只关注纯粹形式的语法研究在中国并不多见,传统语法研究就一直比较重视意义(徐通锵等 1987;胡裕树 1994;陆俭明 1993:5;等等)。而近来徐通锵等先生强调汉语构词法核心是语义而不是语法,很大程度上也基于这种认识。

对语义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一些语法现象的本质。这